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陕西卷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视角

胡竹清

(西北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127)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中国省别全志》系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各地所做田野研究的基础上, 编纂出版的一套中国分省志书, 也是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编撰的中国志书。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看, 该志书还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代表作。文章以陕西省卷为例, 对其编纂背景与目的、资料来源、内容构成、记述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了评价, 指出其对我们今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东亚同文书院 区域国别学 日本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6>

中国的地方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 方志修纂难以系统开展, 各省方志合集更属稀缺, 除白眉初主编的并不完善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外, 并无二例。而一个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情形是——建立在周密的实证调查基础上的完整的中国各省志书从编, 是日本人于 20 世纪上半页修纂、出版的, 这便是《支那省别全志》与《新修支那省别全志》。”^[1]2015 年, 中国国家图书馆将这两套志书进行影印并改名为《中国省别全志》出版。在此前后, 学界还涌现了一批利用这两套志书开展中国边疆史、地方史的研究, 如周长山、周凌瀚^[2]对《中国省别全志》广西卷的研究, 杨德芳^[3]对《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的研究, 张文芝^[4]对《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云南卷的分析, 李彬^[5]对《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的研究等。研究结果一方面指出其服务日本侵华的负面作用, 同时对其资料价值也给与肯定。近年来, 这两套志书中的一些卷次也被译成汉语, 足见学界对其关注。

对于“日本人给中国编纂地方志”一事, 可以从一个学术视角去把握, 即区域国别学 (Area studies) 视角。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对世界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深入研究的学科领域 (2022 年 9 月, 区域国别学被增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著名的非洲学

作者简介: 胡竹清 (1986 年 9 月); 男; 汉族; 陕西省咸阳市; 博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近日中日关系史。

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指出：“我们今天开展区域国别学，换言之就是中国要给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写地方志。”^[6]而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正是一百年前日本人给中国编写的地方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区域国别角度对《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背景与目的、资料来源、内容构成和记述特点等进行分析，对我们今后更好发展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在考察《中国省别全志》前，有必要对与其之相关的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以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旅行调查”做一说明。三者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东亚同文会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主办机构和《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机构，而编纂《中国省别全志》的资料则来源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所做的“大旅行调查”。

一、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大旅行调查”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潮，随之也成立了不少研究中国和东亚问题的组织和团体。1898年11月2日，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兴亚”组织^[7]，首任会长是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该会还公布了以下四条活动纲领：（1）保全中国；（2）促使中国改革；（3）研讨中国时事，以期厉行；（4）唤醒舆论。东亚同文会的总部虽然位于东京，但其主要活动机构则设在中国。其中，东亚同文书院和东京同文书院是该会的主要事业。东亚同文会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从1899年开始，每年从日本外务省机密费中获得4万日元津贴。津贴是不间断的，东亚同文会也忠实地向外务省汇报情况和报告，这使该会打上了半官方的印记，成为20世纪初20多年间日本对中国进行研究及文化事情最重要的机构。”^[8]1922年，东亚同文会改组为财团法人，成为发展中日两国文化的教育组织。

1900年5月12日，东亚同文会在中国江苏南京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是根津一。同年8月，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南京同文书院迁往上海，1901年5月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以下简称“书院”）。办学宗旨名为“讲中外之实学，教中日之英才”，实为日本培养掌握汉字文化，熟知华人社情的“中国通”。书院初设政治、商务两科，学制均为三年，学生主要从日本各府县选拔（多为公费生）。1939年，经日本政府批准，书院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后，书院关闭。

书院在办学中有一项特色活动——“大旅行调查”：每年将毕业班学生（日本人）分为数组（每组3-7人），派往中国内地，花费3-6个月的时间做各种专题调查，并将收集来的资料和信息整理撰写成调查报告书提交学校。这些调查报告书除了书院和东亚同文会各保存一份外，还要另外抄送三份，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和农工商省。大旅行调查从190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五千名书院学生对中国进行了“卷地毯”式的调查，调查范围几乎遍及除西藏外的中国所有省份，旅行线路总计达700条（见下图1），调查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日本书院研究的权威、爱知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藤田佳久指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做的中国大旅行调查，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还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这样的调查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找不到先例，甚至也是迄今为止日本人在海外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调查活动。”^[9]

由于大旅行调查是一届学生接着一届进行，所以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也是越积累越多。而书院则以学生提交的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相继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研究丛书。其中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是《中国经济全书》（全12卷，1907-1909）、《中国省别全志》（全18卷，1917-1920）、《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全9卷，1941-1946），这三部丛书共同奠定了书院在日本中国学界的历史地位。

如前所述，国内学界近年来也非常关注《中国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新修中国省别全志》（以下简称《新修全志》）。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10]教授评价《全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以新的视

国将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我国国民必须尽快熟悉了解中国的国情民物，深谋远虑，防患未然。（中略）然而讲明当今中国的国情民物，怎能不是我国人的一大紧急要务。唯独遗憾的是，中国国情复杂、民情物况繁多错杂，缺乏有益于钻研中国的良书。作为一衣带水的比邻，我国人中彻底精通中国情况的人却很少。本院虽才疏学浅，愿尽绵薄之力，对中国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物产，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大小事情进行讨究阐明，为世人研究中国提供便利。

从两篇序文看，日人编纂《全志》的背景与当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尤其是日本的对华战略有密切关系。而当时市场上缺乏记述中国国情书籍的这一现状是促使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一个直接原因。如前所述，书院是由主张“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所设立，自然会反映该会的方针。另外，“书院接受日本政府的财政援助，并在行政上接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管辖和监督。书院院长的任命、系科的置废，学制的变更等事务，大都由政府决定。”^[12]而且，从人物关系看，不论是书院还是东亚同文会，都与日本政府、军方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见下表 1）。郭墨寒^[13]从书院办学的角度指出，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目的之一是对书院学生大旅行调查资料的总结与炫耀，是日本重要的文化形象工程。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借用今天的话语就是，“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成果”。编纂《全志》就是对书院办学成果最好的一个宣传和展示，有助其更好从日本政府方面获得更多资助。

表 1.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校长）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校长）		
任期	姓名	简介	任期	姓名	简介
第 1 任 (1898-1904)	近卫笃磨	公爵、贵族院议长	第 1 任院长 (1901-1902)	根津一	陆军出身，曾在参谋本部任职，长期从事对华谍报工作
第 2 任 (1904-1907)	青木周藏	子爵、日本外相	第 2 任 (1902-1903)	杉浦重刚	众议员、国粹主义者，裕仁天皇的老师
第 3 任 (1907-1918)	锅岛直大	候爵、第 11 代佐贺藩主	第 3 任 (1903-1923)	根津一	
第 4 任 (1918-1936)	牧野伸顯	伯爵，大久保利通之子、日本政坛元老	第 4 任 (1923-1926)	大津麟平	台湾总督府官僚、岩石县知事、德岛县知事
第 5 任 (1936-1945)	近卫文磨	公爵，贵族院议长、三次出任日本首相	第 5 任 (1926-1931)	近卫文磨	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副会长
			第 6 任院长兼第 1 任校长 (1931-1940)	大内畅三	众议员，1939 年升格为大学后的首任校长
			第 2 任 (1940-1944)	矢田七太郎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曾参加 1927 年东方会议
			第 3 任 (1944-1945)	本间喜一	末代校长，爱知大学创始人

来源：冯天瑜 (2018):1-17。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二）资料来源

陕西卷在卷首“凡例”中提到，该卷主要参考了以下 7 期、共计 9 个调查班的调查报告，时间跨度为 1907-1916 年。

1. “陕西河南班”第5期生、调查时间为1907年
2. “晋秦班”第7期生、1909年
3. “甘肃鄂尔多斯班”第8期生、1910年
4. “清化镇汉中班”第9期生、1911年
5. “甘肃四川班”第11期生、1913年
6. “秦蜀班”第11期生、1913年
7. “陕西班”第13期生、1915年
8. “河南山西班”第14期生、1916年
9. “湖北四川班”第14期生、1916年

从以上各调查班的名字推测，有的调查班以陕西省为中心开展调查活动，而有的则同时横跨几个省份（图2），即“编纂陕西卷的资料也有一部分是从其他省份的调查报告中摘录的。另外，《陕西省》中的各章（节）也对具体引用了哪一期学生的调查报告书有明确说明。比如，第8编第14章“乾州的货币及金融机构”引用了第8期、第9期、第11期三期学生的调查报告，说明有三期学生都到过乾州，只不过每期学生的调查内容可能不尽相同，后人在调查时候应该是对前人未调查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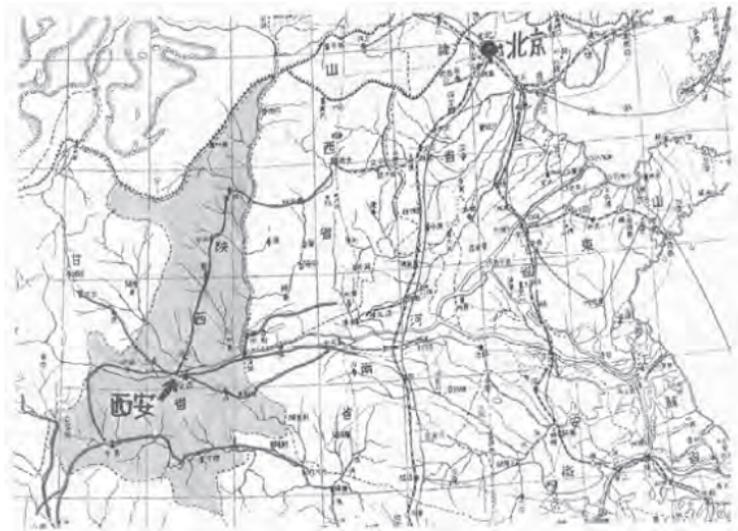


图2. 书院第5-14期学生的调查线路图（1908-1917）

来源：藤田佳久(2018):15.

（三）内容构成

《陕西省》由10编构成。第1编是“总说”，包括6章，分列陕西省的沿革，清代及民国初期的行政区划，面积、人口与人种，地势河川，气候及交通。第2编是“都会”，共43章，分列43个县（市）的概况，包括位置、人口与户数、城墙与街道、交通、农业和工商业、官署及主要建筑物、饮水用、物价及生活水平等。第3编是“交通及运输机构”，由4章构成，介绍了陆运、铁道、水运以及各地间的陆运及水运。第4编是“邮政及电信”。第5编是“生产业及矿业”，由5章组成，介绍了（27个县的）农业、养蚕业、林业、畜牧和（11个县的）矿产。第6编是“主要物产及工业”，设5章，介绍了石油、麻、（23个县的）主要物产、（15个县的）工业。第7编是“交易及进出口商品”，设2章，介绍了4个县的商业状态、9个县的进出口商品。第8编“货币及金融机构”，共25章，列举了25个县的货币及金融机构。第9编“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共2章。第10编是“度量衡”，共23章，介绍了（20个县的）度量衡、海关以及中国政府所定的度量衡。

(四) 记述特点

较之国人编纂的旧地志,《全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视角独特、材料新颖。由于是外国人看待中国事物,所以记载了很多他们认为重要、新奇,而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到了今天就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比如,陕西卷在介绍各(市)县时,除了位置、市况、交通、城墙、城内主要街道及著名建筑物、商业和农业相关信息,还记载了饮用水(水质和口感)、生活水平(日用品的物价及工资水平)及贫富差距情况等信息。另外,本卷中还附记了一些公司合约与章程,如《创办陕西第一牧场简章》《中美石油合办契约》,列举了一些当铺、票庄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票据,如邠州便民当发行的当票(图3)、宜川县市面上流通的钱票子(图4)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史书和方志中非常少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史料价值愈显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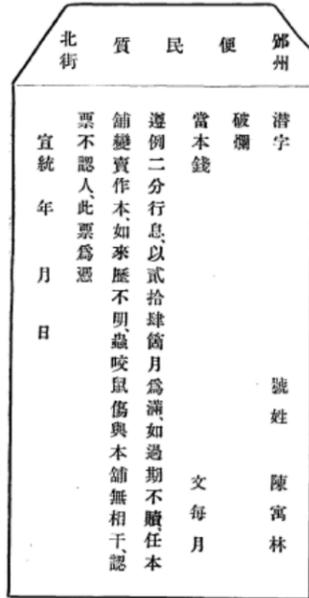


图 3. 邠州便民当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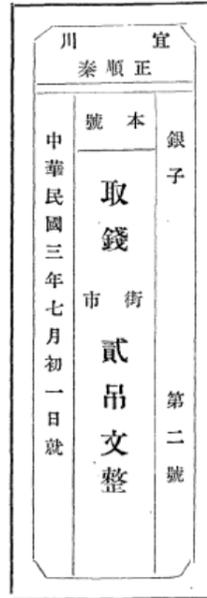


图 4. 宜川县钱票子样本图(正面)

2. 方法科学、手段先进。与以往国人编纂旧地志时,侧重对前人资料的引述不同,《全志》的编纂建立在日本人对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背后蕴含的是西方实证科学思想。从陕西卷所列的图片、地图及其他信息看,当时每个调查班都配备了照相机,学生们也掌握地理学、测绘学及统计学相关知识。比如,第3编第4章关于“凤岭-留坝间思德桥处的河流信息”写道:“河宽16米,水深2.5米,流速3米/秒”。^[14]很难想象,当时的日本人是如何测量这些数据的。第1编第4章关于陕西北部的地质情况写道:“这里的黄土也含有很多的石灰,如果往地上投放一些酸类物质的话,就能看到发生化学反应。另外,由于这里的水也含有大量的石灰和酸分,所以如果将硝酸银放入水中,水就会变成乳白色”。^[14]可见日本人在当时已掌握了西方化学相关知识。

3. 图表丰富、数据详实。正所谓“物非图则不明,事非表则不详”,用图、表来说明事务,简明易懂。陕西卷中的图片(包括照片、手绘地图、事物说明图)多达116张,表格约140余张。该卷对很多事物的记述都不是停留在简单粗线条式的文字描述上,而是辅之以翔实的数据。这些数据有的来自国民政府统计,有的是书院学生亲自调查所得。比如,第2编第3章有关临潼县的“市况”记述如下:“市况:临潼县城人口有7000人,户数为1000户左右。我们从早上10点开始,在县城西门对10分钟时间内来往的人数进行了测算,有120名行人、3辆马车经过。”^[14]再比如,第5编第4章“畜牧”在将陕北绵羊与东北新民屯的绵羊进行比较时,不仅分年龄,而且还分公母,甚至对两地绵羊身体各部位的长短都做了精确的记录(见下表2)。

表 2. 陕北清涧县的绵羊与东北新民屯绵羊的比较¹

毛色及部位	新民屯		清涧县	
	母羊、四岁	公羊、四岁	母羊、四岁	公羊、四岁
毛色	脖子前黑	白色	白色	白色
角间	0.20 尺	0.25 尺	0.20 尺	0.11 尺
眼间	0.45 尺	0.45 尺	0.30 尺	0.22 尺

来源：东亚同文会 (2015):444-445。由笔者整理制作而成。

4.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如上所述，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市场上）缺乏记述中国国情现状的书籍。那么，如何获得相关信息呢？书院给出的答案是田野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书院学生通过深入中国内地，对各地各方面情况做调查研究，才得以了解真实的中国，并掌握了一手资料。而根据这些调查资料编纂的《全志》自然在笔墨分配上以反映陕西近况为重点。

《全志》除了以上的特点，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地区的缺失。由于《全志》的编纂资料主要来自书院学生的实地调查，所以只能记录那些学生去过的地方的情况。至于学生没有去的地方，则缺少相关记载。二是内容方面的不完整与错误。陕西卷在内容构成方面缺少对名胜古迹、教育、文化、官府和警察等方面的记述。此外，一些地名等存在错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人在编写《全志》时，是基于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来描述和看待中国事物。对于其中反映的不正确史实、立场和价值观等，需要警惕和仔细辨别。

三、结语

《全志》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虽然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和负面影响。正面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料保存。《全志》记载了大量在我们的地方志中很难找到的一些东西，为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商业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提供一份独特、宝贵的史料；二是学术方法借鉴，《全志》是一部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志书，在调查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值得借鉴。《全志》的负面影响有二：第一，东亚同文会编纂《全志》，其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制定对华战略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和准备。通过《全志》，日本侵略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各地的资源分布、道路交通以及产业结构等关键信息，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提供了精准情报信息，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第二，《全志》中的一些内容存在明显的歪曲和偏见。日本按照自己的需要，故意丑化、弱化中国形象，企图在日本国内塑造对侵华有利的舆论。

《全志》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一个产物，而我们中国对海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有很长的历史。国家之所以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和发展，正是出于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的需要。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而言，不论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亦或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是加强对外传播能力，都迫切要求我们对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有深入了解。《全志》其对我们今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有两点启示：第一，现有的国别研究可以细化为省（州）别研究。目前我们不乏“某某国史（志）”之类的研究成果，但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州（省）、或某个特地行业（领域）的研究还比较匮乏。第二，扎实开展田野研究。《全志》是日本人靠走路走出来的。我们今天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不能只坐在书斋中，更要深入对象国，扎扎实实开展田野调查，掌握一手资料，将研究问题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

争取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支持。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冯天瑜.(2015).《中国省别全志》(影印版)序言.In 文化发展论丛(pp.38-4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周长山 & 周凌瀚.(2012).民国初年的日本版《广西省志》.广西地方志,(5),37-40.
- [3] 杨德芳.(2013).《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所载民国时期的贵州.贵州文史丛刊,(2):127-130.
- [4] 张文芝.(2014).一部特殊的云南省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云南档案,(1),24-26.
- [5] 李彬.(2019).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的调查——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为研究范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40(1),193-197.
- [6] 刘鸿武.(2023).区域国别学的实践路径:两头能落地,中间挑得起.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演讲.<https://wyxy.nwu.edu.cn/info/1041/1261.htm>.
- [7]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
- [8] 任达.(2006).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9] 藤田佳久.(2020).東亜同文書院生の「大旅行」の展開と記録された近代中国像.同文書院記念報,(28):29-50.
- [10] 高启安.(2010).日本人编撰的中国地方志:《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以甘肃卷为主.图书与情报,(6):152-156+2+161.
- [11] 藤田佳久.(2018).東亜同文書院生の大調査旅行と『支那省別全誌』および『新修支那省別全誌』との間.愛知大学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報,(26),3-28.
- [12] 冯天瑜.(2018).解说.In 冯天瑜,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总目、索引(pp.1-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13] 郭墨寒.(2014).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 [14] 东亚同文会.(2015).中国省别全志·第七卷·陕西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